



# 再探莫言小说《蛙》的复调叙事结构

唐冰炎

(新余学院人文学院, 江西 新余 338004)

**摘要:** 在莫言众多的长篇小说中, 民间乡土、国族历史、个体生存繁衍、文明的进步与退化成为他文本中包罗万象的主题, 而鲜明的复调结构以多样化的形式出现在几乎所有文本中。《蛙》这一文本作为与时下社会仍高度关注的生育问题息息相关, 文本中复调叙事给文本的叙事空间带来的巨大张力与莫言通过中国生育史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引发的深度人性拷问。莫言凝视历史的态度是批判和审慎的, 但他并不孤立地看待过往的历史, 更注重贯通历史与现实社会, 以全方位的视角呈现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以求看清现象之下的本质。他总是呈现出一个事件或一群人物, 然后自反或用戏谑的方式消解和掩盖批判的锋芒, 造成暧昧含混的对话语境书写出个人生存境况、人类群体生存困境及生命价值等问题, 通过写作自我的批评和反思叩问灵魂希望人们透过作品进行自我解剖与自我救赎, “复调”与“对话”的平等性、多元化视角挑战了传统小说独白叙事的一元化、权威性视角, 复调的叙事策略使文本呈现出一种未完成性, 既拓展了文本的叙述空间也生成了文本的多义性。

**关键词:** 莫言小说; 复调结构; 叙事策略; 文本的多义性; 多元化视角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日

**中图分类号:** I247

**通讯作者:** 唐冰炎, 新余学院人文学院

##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structure in Mo Yan's novel "Frog"

Tang Bing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nyu University, Xinyu 338004, Jiangxi)

**Abstract:** Among Mo Yan's numerous novels, folk land, national history,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and the progress and degradation of civilization have become all encompassing themes in his texts, and distinct polyphonic structures appear in diverse forms in almost all texts. The text "Fro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fertility that is still highly concerned in today's society.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in the text brings tremendous tension to the narrative space and the deep human nature questioning triggered by Mo Yan through the complex issue of Chinese fertility history. Mo Yan's attitude towards gazing at history is critical and cautious, but he does not view past history in isolation.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onnecting history with real society, presenting th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ns and outs of events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see the essence beneath the phenomena. He always presents an event or a group of characters, and then reflexively or jokingly dissolves and conceals the critical edge, creating ambiguous and ambiguous dialogue contexts to write about personal survival situations, human group survival difficulties, and life values. Through writing self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he questions the soul and hopes that people can dissect and redeem themselves through the work. Th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s between "polyphony" and "dialogue"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monologue narrative of novels from a unified and authoritative perspective.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strategy makes the text present an incompleteness, expanding the narrative space of the text and generating ambiguity.



**Keywords:** Mo Yan's novels; Polyphonic structure; Narrative strategy; The ambiguity of text; diverse perspectives

在中国当代文学七十余年的发展史上，莫言无疑是重量级作家之一，他创作的特点其一表现为高产，其二是他在文体实验、叙事策略、语言艺术、历史文化等诸方面的强烈探索与创新的精神。莫言小说有鲜明的复调结构的特征。他的文本中找不到一元化的价值判定和绝对化的道德标准，也不存在统领全局的核心意识与核心主人公，正如巴氏所说“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同一般的作者议论，具有同样的分量和价值<sup>[1]</sup>。”复调包含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多元意识正是复调叙事的真正内涵和精神核心，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文本主题可以解构一元化的独白叙事所体现出的意识霸权，矛盾甚至对立的观念、价值和思想可以和谐共生，从而让意义空间得以无限延展<sup>[2]</sup>。

莫言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结构就是内容，结构甚至就是变成了小说家艺术表现艺术才华的一个地方，一块领域<sup>[3]</sup>。”无疑莫言在每一部小说文体上都体现了他的匠心独到，《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我”与“豆官”多个叙述视角不断转换，构成“叙述时空的多维化”，时空界限被打破而获得了更大的叙事张力；《檀香刑》中借用传统戏剧三段式“凤头”、“猪肚”、“豹尾”的文体，“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之前都嵌入与正文呼应的《檀香刑》猫腔戏文，媚娘浪语、小甲呓语、赵甲狂言、钱丁愤恨共振形成了一台多音齐鸣的猫腔大戏；《酒国》中书信与故事叙述相互镶嵌，虚实相生。新颖多变的复调结构赋予文本瑰丽奇崛的想象力的同时也延展了文本暧昧多义的深层内涵。我们从来无法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找到单一而确定的价值判定，也无法寻找一种万金油式的文本结构，原因就在于莫言让小说的形式与意义处于无限流动的未完成状态，永远向新的方向敞开。

《蛙》也是一部极富创新意味的复调小说，它的文体结构形成了大型对话，结构自身就是一种隐喻的存在<sup>[4]</sup>。全文共计五部，由三种不同文体组

成：一是剧作家万足，笔名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表达自己创作剧本的缘起，有意暴露话剧的虚构性，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使这一部分带有元叙事的意味，二是蝌蚪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书信体小说，以我、我姑姑、陈鼻三家的感情史与生育史为中心线索讲述高密乡六十年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遭际，三是一部同名九幕话剧，遭遇创伤的人在此剧中先后登台，演示荒诞不经的世道人情。书信体、小说体与话剧体反复咏唱的是同一个主题，但叙事视角与叙事风格各异，书信体平实真挚，小说体汪洋恣肆、千头万绪，话剧体充满后现代的黑色幽默与荒诞疯癫，从而多层次多侧面展现出事件的丰富性，三个部分构成互补互动同时互相矛盾与互相颠覆的“大型对话”。

### 一、三重文体的反复咏唱

如果说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者蝌蚪的声音里有多重二级叙述者的声音交织混杂，形成暧昧含混的不可靠叙述，那么五封书信中的叙述与话剧文本中的叙述则是相对确定并形成对话的两种伦理立场，这两种声音恰好又构成了双声对话。书信的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方向一致，叙述声音统一，相当于其后几个章节的引言，情感真挚，并以主流话语立场做出了价值评判，有历史叙事的真实可靠；书信体小说虽然也以线性时间推进，但多音齐鸣，多条故事线索交织，意义扑朔迷离，不啻为一部民间传奇，话剧体文本则是一部时空交错、荒诞离奇的后现代风格寓言，解构了前两部分营造的逼真性。三个文本互相冲突而又互为补充。

#### （一）独白叙述者的狡黠

与蝌蚪切身相关的两个事件：王仁美因引产去世与陈眉代孕在三个文体中反复叙述，但三次叙述的视角转化呈现出事件不同的侧面。在书信体中，作为独白叙述者的蝌蚪拥有视角的垄断性，书信部分构成了后文书信体小说与话剧的元叙述，不断暴露小说与话剧虚构的痕迹，也有诸多与后文相冲突的疑点，甚至五封书信自身也存在叙述的混乱和矛盾。蝌蚪的书信对象为一位侵华日军



军官之子、剧作家杉谷义人，更为巧合的是这位军官在入伍前的职业是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抗日战争时期还曾掳走幼年的姑姑及家人作为人质。在书信体的叙述中，蝌蚪的叙事温柔敦厚、谦卑恭敬，修辞也极为客套官方，且前四封书信中都明确昭示了他的主流伦理立场。

王仁美的事件中，姑姑以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公共身份合法化地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但在书信的叙述中，蝌蚪有一席崇高悲壮的辩护词：“我不抱怨姑姑，我觉得她没有错，尽管她老人家近年来经常忏悔，说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sup>[5]</sup>。站在宏大的历史理性视角，蝌蚪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及姑姑、王仁美母子的死已做出了价值评判。

陈眉代孕的事件在第四封信书信的叙述中蝌蚪略去了其中曲折迂回的部分，只以老年得子的既得利益者视角轻描淡写地提及事件的最终结果：“年近花甲的我，最近成为一个新生婴儿的父亲！先生，不管这婴儿如何而来，不管今后围绕着这婴儿还将产生多少麻烦事，我还是要请您这个大贵人祝福他；如果可能，还请您赐他一个名字<sup>[6]</sup>！”看似日常的叙述与前文“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的忏悔姿态及后文话剧中同一事件转换为陈眉、陈鼻的视角再叙述时呈现的令人惊悚的真相分别形成了有趣的对话，留下了迷雾重重的疑点。

## （二）不同文体的反复咏唱

前四封书信里，忏悔与赎罪在蝌蚪独白式的叙述中反复出现的话语，但每一次他提及的心灵救赎的方式只是写作：“发誓要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

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sup>[7]</sup>。”这苍白无力的方式仍然只是他减轻内心罪感的自我救赎方式，带有内倾性与利己性，而非真正自省与批判的姿态。

直到第五封信，即话剧文本之前的书信中，蝌蚪一反常态地放下了前四封信中克制的谦恭与自圆其说的主流话语姿态，称谓也从第一封信的“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变为“亲爱的先生”，第一次脱离了主流话语建构的宏大完美的拟像世界，剥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丈夫与父亲，第一次以生命主体的自觉来忏悔自我的原罪：“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sup>[8]</sup>”。并对此前主流伦理与生命权的残酷博弈产生质疑与反思：“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sup>[9]</sup>？”

这段忏悔与书信体小说部分蝌蚪在王仁美的死亡与陈眉代孕问题上的纠结暧昧态度形成了对话：小说中的他把王仁美怀孕的责任推给王仁美自己、推给取环的袁腮，明知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毫无回旋的可能，却佯装劝说姑姑网开一面允许王仁美生下孩子，以一套“维护单位荣誉”的崇高修辞遮蔽了自己前途优于妻儿生命的利益考量，最终半推半就地把王仁美送上了引产床。在代孕问题上，他从反对转为接受是在中美家宝妇婴医院看到“百子图”之后，崇高壮美的修辞再一次遮蔽了他延续血脉的利益考量：“这是真正的伟大事业，高尚的事业，甜蜜的事业……我听到了一个最神圣的声音的召唤，我感受到了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sup>[10]</sup>”对王仁美、陈眉的道德负疚也自欺欺人地升华为对死在王仁美腹中孩子的补偿而消解：“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sup>[11]</sup>”。

而在话剧的第九幕，蝌蚪与姑姑的对话和书



信体部分和小说部分的叙述形成另一种对话：陈眉生产后代孕费被克扣，但她并不相信孩子已死的谎言，四处报案要找回孩子。后来她误闯电视剧《高梦九》的拍摄现场击鼓申冤，高密县长高梦九效仿清官包龙图智断争子案的办法，却徇私枉法将孩子乱判给了小狮子。在话剧寓言式黑白颠倒、真假混淆的荒诞情境中，蝌蚪说服姑姑的逻辑残酷却又无懈可击。他的理由有二点：一是从孩子的角度来权衡，陈眉不仅神志失常，而且是个严重毁容、面目狰狞的疯女人，如果将孩子交给这样的母亲抚养，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二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尽管在情感道义上感到歉疚，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孩子母亲神志失常、不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况下，孩子由父亲抚养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也仍然会这样裁决。

话剧里蝌蚪不再以军官的公职身份使用国家话语的逻辑进行价值评判，而是以强势群体的身份利用法理正义的利刃不偏不倚地刺中陈眉毁容、疯颠的缺陷，轻而易举地获胜，对新生命极致赞颂的崇高溢美之词掩盖了背后恶的真相，话剧中诸多荒诞的表征揭开了经济繁荣之下社会的复杂与残酷。蝌蚪的三重身份——剧作者、叙述对象（剧中人）、作为剧本叙述对象的叙述者，决定了他以不同的叙述视角会呈现出不同的主体意识，因而有了他在书信体中的崇高与主流、小说体中的推诿与暧昧、话剧体中的冷酷与强悍，也正是这样的全方位叙述构成了三种文体咏唱同一主题时复调声音。

## 二、人物关系的复调

### （一）赎罪与犯罪——姑姑与小狮子的难局

《蛙》的文本时间跨越了从建国初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近六十年的发展史，随着不同时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政策的变化，国民生育状呈现四个大起大落的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1957年，建国初期风调雨顺、经济繁荣，迎来第一个生育高峰；第二阶段，1959—1961年的粮荒时期，生育率基本归零，第三阶段，粮食问题解决后迎来1963年—1965年的婴儿潮，而1965年以后，人口急剧增长带来多方压力，计划生育由提倡逐步变为强制执行，与民间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冲突而引

发一些荒唐的社会现象；第四阶段，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代孕这一畸形现象也由此诞生并带来可观的商机<sup>[12]</sup>。

文本中“姑姑”的身份紧随新中国生育史的需求变化，在民间的生育热潮中，妇产科医生的“姑姑”亲手接生了近万个婴儿，成为“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蝌蚪这一代“地瓜小孩”都印证着她接生史上的辉煌时期<sup>[13]</sup>。未曾谋面的杉谷义人想象的姑姑正是这样一个坚强、正直、敬业的形象：“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而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她“送子娘娘”的身份荒诞变成了“屠婴妖妇”，接生转为杀生，毫不留情地终结每一个妇女腹中计划外的胎儿。她与徒弟小狮子一生都反复咏唱着西西弗斯式的犯罪与赎罪的主题。

#### 1. 姑姑与小狮子的对位咏唱

姑姑与小狮子是文本中互为镜像的一对人物，如影随形，观念、性格、行为、命运都如此相似，只偶有错位。由妇产医生转变为计划生育执行者之后的姑姑，个体情感与主体意识完全被国家意志取代，为了把每一个超生婴儿终结在“锅门”里，她对违反政策怀孕妇女的态度是“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为此穷追猛击耿秀莲，不惜拔树拆房威逼王仁美一家，甚至刻意大办蝌蚪小狮子的婚礼迷惑陈鼻王胆达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姑姑最忠心的徒弟小狮子跟随她执行每一桩追赶围剿超生孕妇的事件。在追赶张拳老婆耿秀莲时，二人彼此应和，配合默契，姑姑喊话“我希望你放明白点，乖乖地上船，跟我们去把手术做了。顽抗是死路一条！”小狮子马上气汹汹地附和：“你即便能游到东海，我们也能跟你到东海！”面对耿秀莲最后无力的挣扎，小狮子流露的是胜利者的喜悦：“有本事你游啊，鱼狗扎猛子啊，青蛙打扑通啊……”，只在追赶陈鼻王胆时，姑姑依旧铁面无私，小狮子有所动摇，有意落水与秦河合谋制造混乱意图放走王胆<sup>[14]</sup>。

二人在爱情婚姻上也奏出了二重唱，她们对秦河、王肝的痴情无动于衷，最终姑姑与郝大手的结合出于消除对以往罪过的恐惧，小狮子的婚姻出自遵从姑姑的指令，身为姑姑的崇拜者，“姑



姑让她去杀人，她立马就会持刀前往，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她们处理婚姻与爱情的立场与身为女性的个体生命情感需求完全分离，更为巧合的是也许由于极端的剿杀生育行为的因果，她们都没有自己孩子，姑姑是年事已高，而小狮子没有生育能力。

## 2. 犯罪与赎罪的难局

姑姑的一生都是在犯罪与赎罪的泥淖中挣扎。她亲手接生了9883个婴儿，却又亲手杀戮了2800多个婴儿；晚年的她在无比恐惧与痛苦中嫁给了当地的泥塑大师郝大手，在他们居住的三间厢房里，所有的窗户都用砖坯堵住，东、南、北三面墙壁上，全是同样大小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放着一尊泥娃娃，这是她赎罪的方式：“……我明白，姑姑是将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姑父的手一一再现<sup>[15]</sup>。”

姑姑与小狮子每一次的犯罪行为与赎罪都是相互嵌入、多重转化的。她们苦苦追赶张拳老婆，致使她大出血生命垂危时，转而全力营救，并献血500CC，使用了最好的药。几十年后，姑姑又在退休前帮张拳的二女儿生了第三胎。在送王仁美去卫生所的前夜，姑姑特地安排部队领导和王仁美共进晚餐并许诺送她的女儿去北京，在抢救王仁美时，她又一次抽了自己的600CC鲜血。她们不放过即将临产的王胆，造成王胆早产大出血时她又伸出了妇产医生的手，亲自为王胆接生，并与小狮子一起抚养失去了母亲又被父亲陈鼻抛弃的女婴陈眉。在犯罪与赎罪、政治与良知之间，身份、角色与立场的冲突迫使她们抉择艰难，从而行为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荒唐。

小狮子的赎罪方式是通过找人代孕填补不能做母亲、不能为丈夫延续香火的缺失，但赎罪与犯罪再次杂缠，代孕本身就是对的代孕母亲的犯罪，更为荒诞的是她的代孕母亲恰恰是她们共同杀害了她的母亲却又抚养她长大的女婴陈眉。小狮子与姑姑又一次刻意模糊犯罪与赎罪的边界，她们合谋编造谎言、制造小狮子怀孕生产的假象夺走陈眉生下的婴儿。小狮子找人代孕本身就违背了民间伦理，而夺走生母陈眉的抚养权更不论在伦理、法理上也都是有罪的，姑姑介入其中配合小狮子假戏真做客观上不仅包庇了徒弟，也包庇了

灰色地带的代孕产业。正是这个事件中相互杂缠的人物关系、错位撕裂的是非伦理使它具备了话剧文本中进行再叙述的价值，话剧中蝌蚪不再作为转述人讲故事，事件相关人姑姑、小狮子、陈眉、陈鼻一一出场，直接面向观众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使这一复杂事件的始末多侧面多视角地呈现出来，奏响了犯罪与赎罪的复调旋律。

## （二）王仁美们的反复咏唱

逃亡途中大出血的耿秀莲死前对姑姑说“万心，你不得好死”，王仁美在引产手术失败后大出血说的是“姑姑，我很冷”，王胆在回光返照时向姑姑道谢“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绝望和无奈，一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谢意。她们三人命运相似，都因计划外怀孕被铁面无私姑姑追逃或强制流产而亡。王仁美的孩子与姑姑有骨肉之亲，她带着引产可以换取女儿进京的憧憬进了手术室，身边人却避而不谈大月份引产的风险，她死前感觉到的冷是一种极度的绝望，王胆虽留下道谢的遗言，但压抑的何尝不是对姑姑冷酷追逼致使她早产惨死的怨愤。她们代表了死于母腹的2800多胎儿和母亲共同咏唱了一个鲜血淋漓的主题：谴责姑姑的偏执强悍，计划生育的不合人性。

三位母亲谴责的明确指向是扮演计划生育政策“刽子手”角色的姑姑，但无论隐含作者还是叙述者蝌蚪都并没有对两个阵营的冲突做出确定的价值评判，文本中始终存在此长彼消的不同声音，相互补充又相互解构。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基本国策的坚定执行者的身份，姑姑所代表的国家意志也有其自足的逻辑：“我们愿意野蛮吗？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蛙》的主题也正隐喻了这一无法消解的冲突：蛙—娃—媧，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象征多子多福，女媧造人，蛙声一片，是农耕文明时代的美好愿景。但在资源匮乏的现代



文明社会，这无疑会带来人满为患、发展受制的困境，究竟孰是孰非至今仍然无解。

### （三）隐含作者与人物的辩驳

在《蛙》的文本中，计划生育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对于站在计划生育宣传者、执行者角度的姑姑们而言：“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但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一旦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多子多福的农民意识碰撞时，问题就变得尖锐而复杂了。是谴责姑姑们因强力实行计划生育而不得不实施的“野蛮”？还是歌颂他们为中国社会稳定进步所作的贡献？这在文本内部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正如吴义勤所说：“莫言的《蛙》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 三、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借助于复调式的叙事，现实、想象、哲学在文本中有机统一，组成具有多义性内涵与外延的独特文体，小说的叙述主体也变成了多个。《蛙》的文本中我们隐隐感受到莫言实际上在国家话语与民间伦理之间处于一种分裂的痛苦，所谓作为赎罪的写作，就像叙述者蝌蚪在第五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最终无法达到赎罪的目的。因此文本中叙述者的评论与事实真实的呈现往往是错位甚至断裂的，在这无法弥合的裂隙中，隐含了丰富的潜文本，凸显了事件本身的悖论性和作者伦理选择的艰难性，而正是这些未被说出的部分，使得整个文本在叙事伦理上具有了含混复杂的深刻。这种含混不是对良知与道义简单回避，而表现出身为作家的责任担当和对事实本身的尊重，他既要对国家、民族负责，也要为生命、历史、良知负责。面对复杂的事实，任何简单化的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的判断模式都是流于肤浅的。《蛙》的文本里触目惊心展示了文明、进步与人性、生命的矛盾冲突，被侮辱被损害者同时也存在个体意识的局限性，但无论以何种正义的名义残害生命的人内心终究会经受

良知的拷问，堕入忏悔与救赎的循环中，无论面对怎样尴尬的历史或如何缜密的逻辑圈套，生命与良知都是不变的定数。

### 参考文献：

-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 [2]莫言。莫言谈文学与赎罪[N]。东方早报，2009。
- [3]宋丽娟。论莫言长篇小说的复调性[D]。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2。
- [4]尹梦。试论莫言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土美学复调[D]。青岛大学，2021。
- [5]王文静。莫言长篇小说文体风格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4。
- [6]胡沛萍，张华。“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 [7]李金才。“新”历史下的民间生命写作——以《蛙》《红高粱》《檀香刑》为例探析莫言对民间生命的表征及讴歌[D]。青岛大学，2014。
- [8]赵阶奎。全面的历史态度——论莫言《蛙》对新历史小说的超越[D]。山东大学，2011。
- [9]吴义勤。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J]。南方文坛，2010，(03)。
- [10]夏小雨。双重幻觉与时代困境——论莫言小说《蛙》[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06)。
- [11]张学军。反复叙事中的灵魂审判——论莫言《蛙》的结构艺术[J]。当代作家评论，2017，(01)。
- [12]周卫忠，宋丽娟。复调理论与生存世界的主体间性——从巴赫金诗学看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J]。齐鲁学刊，2017，(05)。
- [13]王金胜，吴义勤。莫言文学的崇高美学及其复调意味[J]。文艺争鸣，2019，(04)。
- [14]张阔。莫言的茂腔叙事及声音诗学[J]。小说评论，2020，(05)。
- [15]莫言。莫言谈文革话题：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看客”[EB/OL]。[2009-12-23] <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9/11/23/052229323.shtml>。

作者简介：唐冰炎（1972-），女，汉族，安徽宣城人，新余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地方文化研究。